

总主编◎王松林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求索丛书

Antiphonal Singing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Antiphonal Singing
of Japan and the Bai Nationality in Yunnan

对歌文化论 ——日本与云南白族对歌的 比较研究

张正军 工藤隆 冈部隆志 远藤耕太郎 著



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资助项目
宁波大学学科建设重点培育学科点资助项目

总主编◎王松林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求索丛书

Antiphonal Singing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Antiphonal Singing
of Japan and the Bai Nationality in Yunnan

对歌文化论 ——日本与云南白族对歌的 比较研究

张正军 工藤隆 冈部隆志 远藤耕太郎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研究的对歌指异性或同性间以恋爱或挖苦或娱乐为目的、按照固定的旋律即兴地对唱的情歌。本书作者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对云南省白族对歌做了长期的跟踪调查,利用自己采录的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资料比较研究了白族与日本的对歌文化,力图用对歌的本来面貌去纠正以往日本学术界对歌研究中的谬误。本书将日本在8世纪时已失传的对歌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之一加以研究,在亚洲对歌文化圈的视域下研究了中国云南与日本对歌的不同层次、功能、目的、持续性原理、有声传承与文字记录、兄妹婚始祖神话文化圈与对歌文化圈、对歌中构建的理想的恋爱与现实中的恋爱、白族的本子曲与对歌等问题。附录中列举了日本古代文献资料中记录的对歌及田野调查时采录的部分白族对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张正军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3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求索丛书/王松林主编)

ISBN 978-7-03-047513-8

I. ①对… II. ①张… III. ①白族—民歌对唱—文化研究—云南省 ②民歌对唱—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J642.215.2 ②J6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4056 号

责任编辑: 阎 莉 张 达 / 责任校对: 郭瑞芝

责任印制: 徐晓晨 / 封面设计: 铭轩堂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7 1/2

字数: 348000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丛 书 序

本套丛书取名为“当代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求索丛书”，旨在向学界展现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近年来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和研究特色，丛书涵盖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化研究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在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是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或曰研究方向主要有外国语言研究(含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应用研究及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等)、外国文学研究(含文学理论与批评)、翻译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其中，外国语言研究属于语言学学科，是研究外国语言及其应用的综合性学科，主要涉及语音学、音位学、词汇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基础性的语言本体研究，也涉及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等理论流派研究，还涉及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文体学、语篇分析等跨学科领域。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外语的教学、使用、规划和政策以及二语习得、外语能力测评、双语和多语现象、语言与思维、心理活动及行为的关系、言语产品的加工与合成(含机器翻译)、词典学等，不一而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影视研究、性别研究、种族研究、数字媒介研究及新闻传播研究等诸多与其他人文学科相关的内容纳入到了本学科的研究范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发展迅猛，大量国外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理论(包括翻译理论)、文学批评理论及文化批评理论由中国外语界学者介绍、吸纳和消化并自觉地运用到他们的研究领域。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研究疆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开阔，跨学科、多界面的研究催生了诸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譬如，近年来国内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就大量吸收了语言哲学、心理学、脑科学、系统论等学科的成果，不再囿于学科内部的界面研究；其他如神经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也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外国文学研究也在世界多元化浪潮语境下呈现出超越和打破传统研究界限的局面。在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外国经典文学被视为研究的“正典”，而通俗文学往往被边缘化，时至今日，这一泾渭分明的研究界线已被打破；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多视角的文学批评方式如生态主义、新历史主义、后

殖民主义、性别和种族批评以及文化研究等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涵，文学研究的空间不断扩大和深化；网络文学这一借助超文本和多媒体载体的互动性极强的文学表现形式颠覆了传统的写作范式，成为当下学者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下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政治、伦理、法律、环境、族群、性别等诉求备受关注。翻译研究本身就是一门跨学科的多界面的学问，它建立在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信息论、心理学等交叉学科之上；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纯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比重有所减弱，跨界面的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理论模式不断引入翻译研究，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所涉及的因素和问题的复杂性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翻译研究自然也必须呈现出跨学科的开放姿态。综上所述，二十一世纪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将迎来一个开放性的、跨学科的崭新时代。宁波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也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学科融合中积累着研究成果，凝练着学科特色，沉淀着学术滋养。

宁波大学是由国家教育部、国家海洋局、浙江省和宁波市共建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学校在1986年由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创立，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建校之初，由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原杭州大学五校对口援建；1996年，原宁波大学、宁波师范学院和浙江水产学院宁波分院三校合并，组建为新的宁波大学，成为学科门类齐全、科教特色鲜明的综合高校；1992年被列为全国高校招生第一批录取院校；1995年首批通过原国家教委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2000年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为省重点建设大学；2003年接受教育部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并获得“优秀”等级；2007年被增列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宁波大学外语学院(起初名为宁波大学外语系)是宁波大学建校之初最早建立的五个专业系科之一，由当时的杭州大学外语系对口援建，办学起点较高，在近三十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学科健全、特色鲜明的办学格局。

宁波是一座开放性的、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港口城市，“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是这座城市的名片。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也是一个开放性、跨越式发展的学科，“笃信达雅”是宁波大学外语学院的院训。本学科拥有一支充满朝气的学术团队，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学科建设取得了突出的进步。2005年本学科成为浙江省唯一的外国语言文学类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2011年新增翻译专业硕士点(MTI)；已建成国家特色专业1个，国家精品课程1门，省创新团队1个，获得省部科研成果奖8项。目前，

本学科共有教授 20 人、副教授 30 人、博士 25 人、在读博士 5 人。近五年来, 学科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18 项(其中在研 16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 16 项、省哲社规划课题 19 项。近五年来在 CSSCI 收录期刊上发表了 160 余篇论文, 覆盖外语类全部核心期刊, 出版学术著作及教材 50 余部。基地学术梯队合理, 发展潜力巨大。本学科已形成五个稳定的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日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学科在以下研究领域具有特色并在国内学界形成一定影响: 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研究、英美文学与文化批评研究、二语习得研究、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日本现当代文学及中日文化比较研究、德语文学与文化研究。本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学科排名在浙江省省属院校中位居前列。据教育部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研究数据(2013 年), 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全国同类学科中排名第 37 位(并列); 教育部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2015 中国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显示, 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位居全国同类学科的前 10.5%。

本套丛书得到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宁波大学中央财政专项(“外国语言文学”)项目的资助以及宁波大学研究生院、宁波大学人文社科处的大力支持, 科学出版社与我们真诚合作, 旨在打造一批学术精品, 既展示已有研究成果, 又谋划未来探索之途。丛书出版之际, 我们谨对所有支持和关心过我们的机构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并真诚期盼继续得到你们的关爱和关心! 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和成长得益于我国外语学界诸多前辈和同仁的大力扶持, 在此我们深表谢忱! 我们祈盼学界专家一如既往进一步支持我们的学科建设工作。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全体教师和科研人员深知学术求索之艰辛, 更深知学术追求乃大学教师终其一生力臻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本套丛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宁波大学外语学科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 丛书中一定尚存诸多值得商榷的学术问题, 敬请海内外方家对其中讹误和瑕疵给予批评指正。

王松林

2015 年 2 月 5 日于爱丁堡

前言

对歌，顾名思义是两人对唱的歌曲，一般特指男女按照一定的旋律即兴对唱的情歌。但是，实际演唱的对歌不仅仅指情歌，根据我们的调查，云南省白族的对歌除情歌外，还有云龙县白族的踏丧歌、剑川县白族的本子曲、洱源县西山乡的“打歌”、鹤庆县的田埂调等。本书论述的对歌是指情歌。在中国，比较有名的对歌有“刘三姐”对歌、黄梅戏对歌等，对歌节的名称因地区和民族不同而有所差别，在广西叫“歌圩”，在云南叫歌会，在古代日本叫“歌垣”。

我们调查过的唱对歌的歌手男女老少都有，一般来说，在比较偏僻的山区，年轻人接受学校教育较少，因不会讲普通话，外出打工者也较少，那种交通不便的小规模的歌会，歌手以未婚的年轻人为主，对歌以找恋人为目的。而在有关部门组织对歌比赛的、规模大的歌会中，赛歌台上的歌手往往是歌技高超的中年人，获得一等奖的歌手可能会被尊称为歌王、歌后，其歌曲会被制成 DVD 销售，歌手可能还会应邀录制电视节目，成名后可能会被政府的文化部门认定为“民间音乐师”或“××传承人”，可能会被安排到歌舞团、文工团、文化馆工作。歌手往往是从小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下学会对歌的，不过，现在随着年轻人的外出打工，村子里已明显失去了以对歌来谈恋爱的氛围。因此，“××传承人”便担负了文化传承人的工作，开始收徒弟，言传身教，被指导的小学生会上台参加比赛。

关于对歌的功能，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应该是不尽相同的。对歌毕竟与现实中的恋爱、婚姻、家庭相关，所以，以往的对歌以寻找恋人、伴侣为主。过去在包办婚姻制度下，一些有缘无分的人也会在歌会上以歌问询对方婚后的生活，在对歌中构建虚拟的恋爱关系；盛大的对歌活动需要大量的歌手及听众，对歌活动的时间、地点是固定的，往往是在神灵的栖居地、在祭祀神灵时举办的，从歌会的地点和对歌的由来故事来看，歌词中言灵的咒力具有驱除恶魔，祈求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的功能，像剑川的石宝山歌会、洱源乔后的观音庙会、茈碧湖海灯会、凤羽的清源洞歌会都是如此。对歌首先是歌，是音乐，通过旋律唱出的歌词比日常会话更能娱神、娱人。

根据我们的调查，湘西苗族的对歌（恋歌）一般是年轻恋人去约会前请歌师写好歌词，自己记住后在约会时唱的；摩梭人的对歌往往是走婚的情人在分手后的挖苦歌；白族在歌会上唱的对歌基本上已演变为已婚者的娱乐活动；傣族赞哈唱的对歌已经成为婚礼上的习俗。因为现在很多人已不会唱对歌，而一些仪式上又少不了对歌活动，所以，主人家会请歌师、歌手来唱拦门歌、敬酒歌、祝寿歌、送别歌等，有的歌会成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手段，对歌正在日益演变为一种商业活动。很多民族、很多村寨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或考上大学，那里的对歌已失去了继承人。随着娱乐项目的多样化，现在即使是留在农村的年轻人也没必要通过对歌这种手段来找恋人。此外，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笔者在湘西苗族地区（凤凰县）看到真正的对歌爱好者已经通过手机微信、QQ群在分享对歌，那种对歌虽然也可以以录音的形式传播，但基本上已经不是有声的音乐，而是文字书写的固态诗歌，失去了传统的对歌场。

历史上，与我国即兴对唱的情歌相对应的日本对歌叫“歌垣”，主要记录在公元8世纪以前的《万叶集》《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中，因为失传时间久远，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日本学者基本上是凭推测在研究“歌垣”，这时多有谬误。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外国人可以进入对外开放地区或凭特别通行证可以进入不开放地区考察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人员可以利用便捷、廉价、高性能的摄像机、录音笔，录制转瞬即逝的歌声。

日本学者（主要是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文化人类学者）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由于不满足于以往经中国文人整理过的歌谣来研究对歌，为了构建日本已失传的公元8世纪以前的对歌模型，也为了保存、发扬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的对歌文化，亲自去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在洱源县乔后观音庙会时，本课题组曾经在风雨交加的晚上彻夜在高山上的聆听对歌，忍饥挨饿，瞌睡时躺在草席或长凳上打盹，冷了用雨衣御寒；有的成员住进摩梭人家里，忍受着蚊虫的叮咬，了解走婚的社会形态对对歌的影响。日本学者在学术会议、杂志上发表调查报告和论文，甚至自费出版专著。这些成果主要有《不丹的相闻歌——正面阐释对歌的预研究》（系永正之）、《“歌圩”考——壮族歌圩节中可见的诸规范》（手冢惠子）、《对歌与反闭的民族志——探访中国古代歌舞》（星野紘）、《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工藤隆）、《田野调查报告·中国云南省剑川县白族对歌（1）（2）》（工藤隆）、《对歌与神话溯源——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日本古代文学》（工藤隆）、《中国少

数民族对歌调查全记录(1998)》(工藤隆、冈部隆志)、《中国少数民族与日本文化——探究古代文学的古层》(工藤隆)、《古代之声——从古层的对歌现场来看》(工藤隆)、《中国广西壮族对歌的调查记录》(手冢惠子)、《摩梭人母系社会对歌的调查记录》(远藤耕太郎)、《云南省白族对歌与日本古代文学》(工藤隆)、《中国湖南省凤凰县苗族对歌调查报告》(工藤隆)、《中国湖南省凤凰县苗族的对歌文化》(真下厚、张正军)、《古代的歌——亚洲的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远藤耕太郎)、《七五调的亚洲——从音律看日本短歌和亚洲的歌》(冈部隆志、工藤隆、西条勉)、《探究对歌的起源》(冈部隆志、手冢惠子、真下厚)、《布依族山歌的民族志——以歌对唱的词藻》(梶丸岳)等。

但是,在中国国内,记录整理过的歌谣较多,学界对对歌的研究较少,本书的出版能弥补一些空白,能有助于了解日本学者的调查研究方法。本书收录的论文只是这20年来研究白族与日本对歌的部分成果,工藤隆的论文提出了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调查对歌,记录、翻译对歌的方法,分析了日本国内对歌论研究的现状,纠正了以往日本国内对歌论的谬误,提出了对歌的层次论。冈部隆志的论文主要论述了对歌的目的、持续性原理。远藤耕太郎、张正军的论文提出了“万叶假名”在记录用声音歌唱的对歌时所产生的问题。

我们还将继续考察对歌的变迁、对歌文化圈与通婚的范围、歌手的日常生活与对歌的关系、“万叶假名”这种文字文化对有声演唱的歌文化的影响等问题。

为便于中国的读者了解日本学者研究对歌的成果,本书一律把日语文献翻译成了中文。读者如果要查阅原著,可根据作者及文献中的汉字追溯到日语文献,敬请读者理解。

张正军

2015年10月7日

目 录

丛书序	i
前言	v
日本的对歌文化	1
白族的对歌文化	7
亚洲的对歌文化	16
近现代日本对歌研究综述	27
工藤隆等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对歌的研究	37
对歌论的现状	43
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日本古代文学	82
白族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	97
兄妹婚始祖神话文化圈与对歌文化圈	126
白族歌会实况与对歌的持续性原理	138
对歌的目的——以中国少数民族对歌事例为视角	148
对歌的有声传承与“万叶假名”研究	158
白族对歌的理想的恋爱空间与个人的恋爱	171
白族的“本子曲”与对歌	192
附录 1 日本文献中的对歌资料	200
附录 2 云南省洱源县西山乡“打歌”歌词	207
附录 3 小石宝山即兴挖苦歌	214
附录 4 段昆云与张五妹即兴白曲对唱	230
参考文献	259
后记	265

日本的对歌文化

张正军 著

引言

上山春平等（1976）照叶树林文化论者提出对歌是照叶树林文化带普遍的社会现象，此后，根据学界迄今为止发表的调查报告，目前已知对歌广泛分布于日本、中国南部至中南半岛北部的山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对歌指异性或同性间以恋爱或挖苦或娱乐为目的、按照固定的旋律即兴地对唱的歌曲，目前盛行于白族、壮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区。在日本，公元8世纪文献中记载的原生态对歌现在已经失传，日本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文化人类学者为了复原失传的对歌，构建对歌的模型，不断地前往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考察。下面简述日本对歌文化的概貌。

一、原生态的民间对歌

对歌在日语中叫“歌垣”“嬬歌”“小集乐”，指在特定的时间年轻男女聚集在一起基于咒术信仰习俗而互相即兴地对唱的恋歌。“嬬歌”是日本东国^①方言，与“歌垣”同义，“小集乐”指男女在桥畔歌舞游乐的聚会。这种对歌有固定的调子，每句歌词的字数往往是3、5、7个字。然而，对歌从字面上理解是两人或两组人互相即兴地演唱的歌曲，其内容可以是创世神话、收获、劳动、丧葬、挖苦对骂等。根据《古事记》（公元712年）、《日本书纪》（公元720年）、《万叶集》（公元8世纪前半叶）、《常陆国风土记》（公元721年）、《肥前国风土记》（公元8世纪前半叶）等的记载，“歌垣”的地点多设在山顶、海滨、河畔、集市等边界地带，如常陆国^②的筑波山和童子女松

① 古时是逢坂关以东诸国的总称，奈良时代指信浓、远江以东诸国，后来指箱根以东，特指关东地区。

② 这里的“国”是日本古代（平安时代及其以前的时代）至近世（德川时代，1603~1868年）的行政单位之一，根据大化改新的国郡制而定，明治维新后变更为郡县制。常陆国相当于今茨城县东北部。

原、肥前国^①杵岛岳、摄津国^②歌垣山、大和国^③海柘榴市^④和轻市等。由此可见，“歌垣”在日本广泛分布于关东至九州地区，它是广义上的对歌的一部分。本书稿主要探讨作为“歌垣”的对歌。在公元8世纪的日本文献中，“歌垣”“嬬歌”（嬬譟）“踏歌”（蹈歌·蹋歌）等明显与对歌相关的资料达17处，其中可能符合上述定义的材料是附录1中的资料A~G。

二、短歌化了的都市对歌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歌中的咒术信仰（言灵信仰）及预祝、感谢丰收的因素逐渐减少，成为未婚男女寻求伴侣的民俗活动，在集市里的对歌明显成为求偶的手段。《古事记》中记录了在海柘榴市这个集市上袁祁命（后来的显宗天皇，第23代天皇）与志毗（平群鲋）为争夺菟田首的女儿大鱼而对歌的场景。《日本书纪》中也记录了类似的事件，小泊瀬皇子（后来的武烈天皇，第25代天皇）与平群鲋为争夺物部影媛而斗歌，平群鲋因此被大伴金村杀死在乃乐山。这两首宫廷叙事歌只是时代和出场主人公不同，但故事情节和被杀的主人公一致，对歌的形式也一致，可能是同一个故事中派生出来的。

在史前时代，日本人只能靠耳听脑记来对歌，当汉字传入日本时，日本人发明了用汉字来记音的“万叶假名”后，文人开始记录、整理、加工对歌，这给自然发生的原生态的对歌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导致了对歌从有声艺术向无声的文字艺术发展。进入奈良时代（710~794）后，“歌垣”活动似乎只存在于日本关东地区的筑波山一带，其他地方已几乎消失殆尽。但是，男女互唱恋歌的和歌^⑤传统从《万叶集》的“相闻歌”发展到平安时代（794~1192）贵族的社交歌而保留至今。在奈良时代，遣唐使、留学生等把中国文化大量带入日本，“歌垣”开始与踏歌融合，演变为宫廷艺能。据《续日本纪》记载，公元734年（天平六年）2月1日“天皇在朱雀门御览对歌，有男女240余人参加，五品以上风流雅士，皆混杂其中，以正四位下长田王、从四位下栗栖王和门部王、从五位下野种王等为歌头，始终唱和难波曲、倭部曲、浅茅原曲、广濑曲、八裳刺曲，都城男女观赏，极欢而散，给表演对歌者赐禄”。

① 相当于今佐贺县和除壹岐、对马之外的长崎县。

② 相当于今大阪府西部和兵库县东南部。

③ 相当于今奈良县。

④ 日本古代集市之一，在今樱井市金屋附近。该地名记载于《万叶集》《日本书纪》中，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608年，日本在海柘榴市迎接隋使裴世清，可见该地在当时是交通要道。

⑤ 和歌是日本的传统诗歌，由音律“57577”共五句31个音节构成。

此外，《续日本纪》还记载了公元770年（宝龟元年）3月28日天皇行幸至河内国由义宫，在那里举办了“踏歌”似的对歌活动，贵族、外国移民等230人参加，盛况空前。对歌者皆穿青摺细布衣，垂着红色长纽，分行徐进。歌曰：

男子踏歌近少女，西方都城万世宫。

答歌曰：

深渊浅濑清如镜，博多川千年亦澄。

当然，日本除了以恋爱、婚姻为目的的“歌垣”外，还有其他场合的对歌，如宴会、日常生活、插秧节等都有对歌活动。

例如，《古事记》仲哀天皇条记载，母后息长带日卖命（神功皇后）在欢迎从角鹿（敦贺）返回的皇太子的宴会上献酒吟歌曰：

此酒非我酿，乃常世国的、像岩石一样屹立着的、药神少名御神之酒，来庆贺千岁，庆贺万岁所献之酒，来，来，一滴不剩地喝干了吧！

王子干了酒后，侍臣建内宿称为王子答歌曰：

此酒的酿造师们，把大鼓当捣臼吧，唱着歌在酿酒，跳着舞在酿酒，所以，此酒是乐酒。

这是日本古代宫廷宴请客人时主人的劝酒歌和客人的谢酒歌。除了这种特别的宴会以外，日常生活中也有对歌活动。例如，《日本书纪》公元334年（仁德天皇二十二年）正月条记录了天皇与皇后的对歌。

二十二年，春正月，天皇语皇后曰：“纳八田皇女，将为妃。”时皇后不听，爰天皇歌以乞于皇后曰：

犹如弦断续备弦，欲娶皇女共寝殿。

皇后答歌曰：衣裳可加穿，两床怎共寝？

天皇又歌曰：难波崎双滩并联，皇女已允续弦事。

皇后答歌曰：夏蚕身披双重茧，寝宫岂能双重围？

天皇又歌曰：皇后独泣回娘家，结伴同行偶为佳。

皇后遂谓不听，故默之亦不答言。

仁德天皇此后爱上了女鸟王，派弟弟速总别王去做媒。女鸟王因担心像八田皇女那样被皇后妒忌，不但拒绝了天皇的求婚，还与媒人速总别王同居了。天皇亲自到女鸟王

家求婚，发现她在织布，便用对歌问她为谁织布，女鸟王也用对歌回答说是给速总别王织外套。天皇知道了女鸟王的心意后便回去了。速总别王回府后，女鸟王用对歌暗示丈夫弑君，后来弑君失败，夫妻俩被天皇追杀。上述故事具有“歌物语”的性质，但体现了当时日常生活中用对歌表达思想的情况。正像附录1中资料E、资料F所示，歌手在对歌中可以赢得爱情，但在皇权面前，如果与天皇、皇子争夺恋人，会招来杀身之祸。

附录1中的资料A讲到“咏歌甚多，不胜载车”。“歌垣”是即兴的、连续对唱的歌曲，在无录音机、摄像机的木简记录文字的时代，“歌垣”确实是无法记录的，即使记录了，那也是无法用车载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无法了解公元8世纪前日本对歌的实况。公元646年，日本在中国唐朝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实行大化改新，公元668年天智天皇即位，开始建立中央集权的律令体制。奈良时代（710~794）是日本律令制的确立时期，在律令制下，中央政府在五畿七道之下设60多个国（地方行政单位），中央政府委任守（长官）、介（副长官）、椽（三等官）、目（秘书）等官员到国司任职。这些官吏到地方后，开始把朝廷的短歌带到地方，按照规范的短歌样式记录“歌垣”，活形态的有声“歌垣”转变为文人用文字记录的固态的和歌，《万叶集》中的赠答歌、相闻歌中浓缩了“歌垣”的影子。当然，就当时的记录条件而言，文人是无法记录悠长的对唱的恋歌的，这也是促使“歌垣”短歌化的原因。

《常陆国风土记》“久慈郡山田里”条记载：“炎炎夏日，远近乡里，避暑纳凉，促膝携手，唱筑波雅曲，饮久慈美酒。”久慈郡山田里在常陆国的北边，筑波山在常陆国的南边，这说明筑波山的对歌在东国广阔的范围内具有示范效应，像山田里举办的小规模的对歌活动也是“唱筑波雅曲”。完整的“歌垣”因其即兴性和连续性是不可能全部被记住的，去筑波山参加歌会的听众只能记住经典短小的“雅曲”来传颂学习。除了前述朝廷委派的地方官员的影响外，“筑波雅曲”的这种示范效应也势必导致“歌垣”的短歌化。笔者近几年在考察湘西苗族的对歌，那里的对歌者是由歌师和歌手组成的，恋人去约会前往事先向歌师讨教歌词，然后在约会时演唱，但是，歌师给他（她）的往往只是一两首歌曲，而年轻人自己又不会即兴编歌词，所以，等到唱完歌曲就只能以会话的形式谈恋爱了。歌师这种“文化人”的存在，正像日本奈良时代的地方官一样，是导致湘西苗族对歌短小化的原因之一。

三、对歌遗风

“歌垣”后来影响了“歌合”“连歌”，现在在日本也有残留，冲绳的“毛游”、秋田县仙北地区的“挂呗”就有“歌垣”的遗风。

“歌合”是把歌人分作左右两组，逐首比较所吟歌曲优劣的诗歌品评会，参加者包括裁判者、吟歌者、本组诗歌点评者。该活动始于日本的平安时代，最早的是公元885年举办的“在民部卿家歌合”，后来发展成诗歌鉴赏。

“连歌”兴起于日本的镰仓时代（1185~1333），以和歌的音律“57577”为基础，第一个人创作“575”三句17个音的诗歌，第二个人创作“77”两句14个音的诗歌，如此往返持续，笔者吟诗需要兼顾与前后其他笔者所吟诗句的连贯性，同时又要有新的创意。长连歌100句为一个作品，连歌的首句后来发展为俳句。

“毛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冲绳一带的年轻男女傍晚至深夜聚集到海边或野外一起饮食歌舞，寻找伴侣的集会，“毛”意为“原野”，参加者的年龄在婚龄期，男的在17~25岁，女的在15~22岁。年轻人在“毛游”场通过对歌、舞蹈、演奏乐器等表达爱意。美国占领冲绳后，该活动演变为海滨烧烤会，现在已没有“毛游”活动。

“挂呗”是两人互相即兴地问答的对歌比赛，属于“7775”调，歌词内容涉及身边的话题、社会问题、政治等。它已被认定为秋田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种“歌垣”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折口信夫（1929）认为“歌垣”起源于神与仕神的处女（巫女）间的神婚仪式，是日本恋歌的起源，从中产生出旋头歌、短歌，成为“歌合歌会”形态和连歌、俳谐形式的母胎。柳田国男（1998）认为与古代“歌垣”相类似的活动可见于传到日本各地近代的民俗事项中，对歌在婚姻习俗中起到选择配偶的重要作用。

工藤隆和冈部隆志（2000）在考察景颇族的对歌时曾听说一方对歌失败就要按照另一方的意志结婚。关于古代日本的男女对歌，有人认为女歌手如果不能继续答歌，就要听从男歌手。但是，那是无法确认的古代习俗，下面列举的秋田县的对歌是勉强可算那种事例的后世民俗。

男：那朵樱花特艳美，我欲折一枝珍藏。

女：你来折枝折不断，我已是有夫之妻。

男：有主之花又何妨，风吹花落我拾到。

女：每日风吹白费劲，紧扎篱笆护我身。

男：风吹大树倒山野，篱笆怎能挡飓风。

女：最终唱曲负于你，坚定的我应允你。^①

① 中仙町乡土史编辑委员会.1989. 中仙町史（文化篇）（“中仙町民谣”）. 秋田：仙北郡中仙町.

四、对歌的特点

(1) 神圣性。从附录 1 的对歌资料 A、资料 B、资料 C、资料 D 来看,早期的对歌是以恋爱、婚姻等寻找性伴侣为目的的,男女青年在神山上对歌互表爱意,有神前盟誓的作用。筑波山是日本古代最有名的对歌场,那里至今仍供奉着日本民族的始祖神伊邪那岐神和伊邪那美神,他们是兄妹夫妻神,最早从高天原下降到人间并创造了日本岛,生育了火神、太阳神、月亮神等。冲绳的“毛游”在海滨举行,而海滨在冲绳人的信仰中是来访神登陆的地方。秋田县的“挂呗”是在神社举行的。这与中国白族的对歌有类似性,白族最盛大的对歌节是在石宝山宝相寺一带举行的,此碧湖海灯会期间的对歌是在道观附近举行的,乔后小石宝山歌会是在观音庙会时举行的。即对歌时不仅周围的听众在欣赏、在评判对歌的拙劣,还有神灵在见证歌手间的爱情。

(2) 竞技性。从附录 1 的对歌资料 E、资料 F 和宫中对歌会及秋田县的“挂呗”等来看,对歌具有竞技性。对歌者要即兴地表演歌曲,这种歌曲要符合曲调、音数韵律、比喻修辞等,总之必须符合对歌的规则。如果失败了,可能意味着恋爱的失败。事实上,从白族的对歌现场来看,现在的对歌主要是歌手在赛歌台上的表演,高水平者将获得奖状、奖金,会被民间尊称为歌王、歌后,所以,歌手的表演非常讲究对歌的技巧,具有竞技性。这种竞技性在同性间争夺恋人时,可能会演变为争斗性,歌手互唱挖苦歌或骂人歌,甚至像志毗臣那样招来杀身之祸。

(3) 表演性。对歌虽然有两人世界恋爱的因素,但两人在确立关系前,心仪的男女青年往往是在公众面前或同伴面前演唱对歌,表达感情的,周围有观众。如果是对歌比赛,那歌中恋情只是虚拟世界,歌手更多地意识到的是表演性。近年来,随着恋爱方式的多样化,对歌几乎演变成了娱乐的表演,歌手往往是已婚者,演唱的目的并非恋爱,而是竞赛获胜。

结语

日本农村神圣的山岳地带在公元 8 世纪前广泛存在着以寻找恋人和伴侣为目的的即兴演唱的对歌,这种对歌活动后来传入城市,在宫廷中与从中国传入的踏歌相融合,变成了宫廷的娱乐活动,歌词也变得短小精练,为后来的连歌、和歌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农村山岳地带的原生态对歌活动在地方官、汉字文化的共同作用下,逐渐演变为民俗活动,直至消失。对歌具有恋爱、表演、竞技等特点。

白族的对歌文化

张正军 著

引言

白族（白族语称 baip hox，“白人”之意）主要聚居于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和湖北五省，人口 1933510 人（2010 年），按人口论，是中国第 15 大民族，其中，云南省的白族有 1564901 人（2010 年）。在云南省，白族主要聚居于大理白族自治州，部分散居在昆明、丽江、保山、怒江等地。白族是南诏国（738~902）、大理国（937~1094，1096~1253）的主体民族，第一次大统一是在南诏中后期，以南诏国王隆舜 878 年改国号为“大封民国”为标志。

白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有大量汉语借词。白族在历史上仿造汉字创制过方块白文，现在一般称之为古白文，并用这种古白文编撰过大量的书籍，如《白古通记》。这与古代日本有相同之处。但是，元末明初傅友德、蓝玉、沐英平定云南后，焚毁了所有官方和民间的藏书，以至于后世无法系统地了解当时的历史和文字。从此，方块白文失去了官方流传的平台而转入民间，现在主要应用于白祭文、白曲唱本、歌谣。

白族对歌目前在剑川县、洱源县一带最为流行，本书考察的对歌主要收集于石宝山、小石宝山、茈碧湖畔。剑川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离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地下关镇约 126 千米，面积 2318 平方千米（赵鼎汉等，1999）^①，人口约 16.4 万人，其中白族占 91.43%。

20 世纪 70 年代前，白族在剑川石钟寺一带举行歌会；80 年代后，为了保护国家重点文物，歌会会场转移到离石钟寺 6 千米远的宝相寺。石钟寺与宝相寺均在石宝山上，石宝山距离大理白族自治州府所在地地下关镇 131 千米，离剑川县城金华镇 25 千米，都有车辆可直达。景区面积 25 平方千米，海拔在 2140~3038 米。

国内由于商业活动的发展，目前优秀的对歌常被录制成 DVD 销售，也有一些记

^① 下面的基本数据也出于此地图册。